

Q & A

發言一：

廖咸浩局長談到，現代性的結果造成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重疊，而此一重疊是很多紛爭的根源，能否請您更深入的闡釋？此外，全球化趨勢下，資本主義顯然愈來愈強化，現代性的存在也是不爭之實；對於現代性造成台灣在認同上的困惑，可能如何消滅？

另一方面，我同意王明珂副所長提到歷史記憶與族群融合問題有關。事實上，觀察族群的衝突或認同，其中除政治考慮外，也可能掩蓋了社會其他許多的矛盾，特別是階級的矛盾。我的困惑在於，歷史記憶若易造成負面結果，有什麼方法可以加以改進？

發言二：

主持人黃煌雄教授曾經對於「認同」、「中國」的涵意，發表過精闢的見解。我認為，如果引用黃教授的論點再延伸下去，可以發現只要運用解剖學，將「中國」的觀念更細緻

地分析出來，很多紛擾會立刻消失不見，因為「中國」二字，帶有文化中國的可能性、血緣中國的可能性、經濟中國的可能性或政治中國的可能性，我們不必過分狹隘的解釋它。

至於沈富雄委員口頭提到有關中國人／台灣人的民意調查，我認為這樣的問題，久而久之會形成一種太過簡化的分類與思考。換句話說，回答的意思和問題的意思不一定相同，加上解讀的意識型態不同，也可能出現偏離的解讀結果。為了減少誤解與隔閡，對於他人的答案，我想應該用比較包容的心情看待，而不要任意嚴苛批判。至少台灣贊同北京政權的人，應該是非常非常少，就這點來看，大部分台灣人的想法可謂相當接近，因此對於「我是台灣人」或「我是中國人」的回答，大家不必非貼標籤，包容看待即可。

廖咸浩 回應：

我的文章主要處理兩件事情：一、中日關係到底怎樣造成了族群問題？二、單純的文化認同為何會變成國家認同？關於前者，我的分析是中日關係代表兩種現代性的衝突；關於後者，我除了討論中日與兩岸的敵對關係，也把民族國家對認同的要求帶進來談。

在談論這些問題時，我試圖不要把現代性和傳統放在對立的位置上。進一步言，我是點出對現代性的過度崇拜，就是對現代性的全部接收，但現代性本身也有許多問題，例如戰爭、環境污染等，這些都值得加以檢討，因此過去五十年來的思考，都在反省現代性到底導致了什麼壞結果。換個角度來看，目前第三世界國家、甚至從前的帝國時代，對於傳統文化的價值、對於生態自然的關懷、對於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，都是比較寬鬆的看待，不會動輒反對傳統、非工業，或質疑別人是否愛國，然而這些都是現代性較少注重的層面。現代性確實不可迴避，但它其實也有很多黑暗面，我們不妨加以修正，不必全盤接收；而傳統的部分，我則希望那些值得保留、應當再生、當初被一竿子打翻船的文化價值，能夠重新拯救回來。

我也呼籲王明珂副所長的觀點，因為台灣的主體性若建立在粗糙的現代性概念上，遲早會崩潰，中國大陸的經濟很快就會追上來，屆時只依憑現代性講究的成長率數字，台灣一定難以存在。可惜的是，當前族群問題如同在比較「本土化和復興中華文化，究竟誰現

代化？」我覺得這些東西非常諷刺。當然，我不是在強求現在大家變得一樣，而是說可以找到共同點，一起重新出發。

王明珂 回應：

歷史記憶對社會造成嚴重分化該如何處理？我認為有兩個層次的思考。首先要慎編歷史教科書，歷史教科書的編纂不只應交由歷史學者負責，更要納進社會學者、甚至人類學者一起投入，以避免歷史學者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偏見，而造成錯誤引導。其次，關於歷史教科書對台灣史或中國史的比重，我雖曾開玩笑的大膽建議「高一上台灣史，高二上中國史，高三把兩者通通解構」，但是認真說來，我認為在高三、大一階段，可以加強有關「歷史記憶」的教育，因為唯有透過更進一步的認知，我們才可能對別人所堅持的歷史、別人是在何種狀況下而強調某種歷史記憶，形成「同情的了解」。

至於社會邊緣人的問題，目前確實是許多研究族群的學者常忽略的環節，因為提到族群，大家很容易連想到比較遠、比較大的人群關係，但幸好人類學、社會學的學術系統

心與我

中，已經注意到一種「親近人群之間的敵意」概念。所謂親近人群之間的敵意，譬如是指兄弟、夫妻、家庭成員或同一地區不同階級者彼此的敵意，而大致的看法認為，人們對外界的恐懼、對族群的情緒，是由親近人群之間的敵意向外投射出去，所以在歐洲中古史、美國新移民史中，都有「獵女巫」的事蹟，後來研究則指出，女巫只是代罪羔羊，她是社會緊張之下的犧牲品。而以在台灣的外籍新娘、大陸偷渡女子為例，她們由於身分的關係，確實非常容易成為這個社會的代罪羔羊，我們對此應有所反省。

沈富雄 回應：

謝謝朱雲鵬教授的提問與指教。我有三點看法：第一，問卷設計通常因為技術的問題，所以都很簡略，但是我想它並不是刻意要去突顯什麼。第二，關於「我是什麼人？」的問題，無論回答「我是台灣人」、「我是中國人」、「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」、「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」，我也同意通通要用包容的心態去理解，因為民調背後未必帶有政黨色彩，學術單位也不乏有人進行相關問卷，所以我想它也沒有刻意要去歧視任何一方。第

三，朱教授猜測台灣社會認同北京政權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很少，我也認為這個比例恐怕在二%以下，而且我猜想，在四種選項中，直接回答「我是中國人」，大概都比較反對獨立運動，或是年長者；回答「我是台灣人」，大概都比較認同一邊一國，或是年輕者；至於中間回答「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」或「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」，也許比較多是朱教授所稱、解剖之後的「文化中國」或「經濟中國」等，而比較不刻意加重「政治中國」的成分。但是無論如何，每一個人都要受到包容。

林滿紅 回應：

我的文章是以「法律」及「心理」兩個面向來討論「認同」問題，特別是要點出穿插在中日關係歷史情結裡，大家所忽略的法律層次；我認為就法律的有效性，作為國際說服的途徑，可能是比較好的方法。所謂法律有效性，首先可以看白紙黑字的條文。以舊金山和約來說，中日和約是它的子法，因此有關「日本茲放棄其對台灣及澎湖群島之一切權利、權利名義與要求」一事，當然只能沿用「聲明放棄」(renounce)的概念與詞彙；繼

而，回溯馬關條約，可以看到清朝當時簽署的是「割讓」台澎，因此即使日本放棄台澎，這裡也沒有「回歸」與否的問題；至於「搬來台澎的流亡政府」是否為清朝的合法繼承人，我認為與整件事完全不相干，現在唯一要確認的只是日本已將台澎給了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」。

另外談到主權的問題。舉例來說，一九七二年琉球決定回去日本，日本希望琉球島上的台灣人歸於日本，但在那個過程中，他們一定要先放棄中華民國的國籍才行。另一個例子是，在一張白紙和一張百元鈔票中，小孩子一定會選百元鈔票，儘管它上面有某些人反對的「中華民國國號」或「孫中山遺像」，但因其背後有國家主權在支撐，有台澎金馬這些家當作為保證，因此具有購買力。天可憐見，台灣往往不曉得自己的主權何在，但事實上，主權是一直存在的。過去兩岸五十年的教育，總說日本「竊據」台灣、「日據時期」如何如何，這是很嚴重的錯誤，而大陸現在就是依照這樣的邏輯，對外宣稱它有收復失土的责任；同時在國際社會上，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甚至已經表態當選後將按「一國兩制」

的方式處理台海問題，可見台灣命運從來不是如民進黨所言「由人民決定」，而是處於國際局勢的壓力之中。如何才能抵抗「一國兩制」的發生？只有拿出前述的法律作為抗衡。

同時要我提醒，法律認同確定後，未必能化解心理認同問題，美日內部迄今亦有種族認同的困難，這些都有待一一解決，不可能期望畢其功於一役。只是主權確定後，有很多事的確無須畏懼，例如究竟要漢語拼音或通用拼音，語言自有其流通性的考量，也不必多做爭議。

